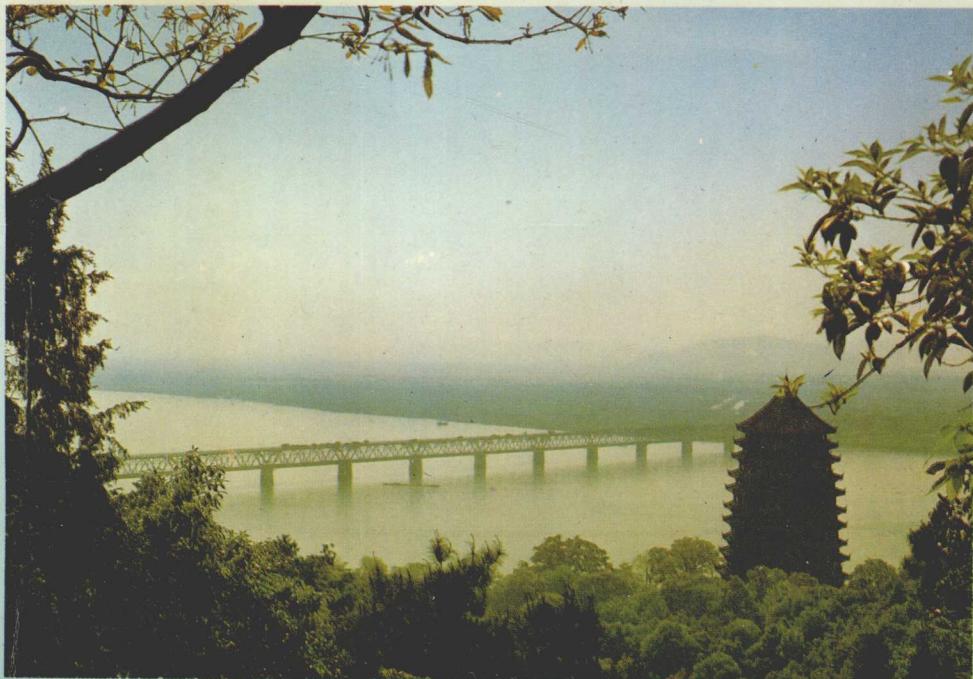


# 话说浙江

huashuo zhejiang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话说浙江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话 说 浙 江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上虞百官横街路3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8.2万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120

\*

ISBN7-213-01043-3/K·274

定 价：5.80元

## 前　　言

呈现在读者朋友们眼前的这本乡土史料读物，是“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丛书求变创新的一次初步尝试。

30多年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累计出版已达50多辑，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是中国、特别是浙江近现代史上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们提供的亲历、亲见、亲闻史实的“三亲”史料，以其求实存真、不可替代的特色，在中国近现代史料宝库中发挥了拾遗补缺、填补空白、匡正谬误、澄清迷雾的独特作用，因而受到海内外史学界和众多阅历丰富的中老年读者朋友们的关注、厚爱和欢迎。但也无庸讳言，以往发表的文史资料，从内容到形式似乎已日渐形成一种趋于固定的程式，基本上保持数十年不变的老腔老调老面孔，因此尽管提供过不少颇有价值和影响的史料，可是多数文章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篇幅冗长，沉闷单调，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生动性、可读性较差的缺陷，对于广大的当代青年读者自然很难产生吸引力，由于读者面的偏狭，使其本应发挥的社会效益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继续保持和发扬以“三亲”史料为主的传统特色的同时，如何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在编撰出版可读性较强，为包括青年朋友们在内的各界读者都喜爱的文史资料读物方面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是我们编辑部同仁们有志已久强烈愿望。而实践这一愿望，却经历了一

番不断探索的反复过程。

最初的探索并不成功。四年之前，本部和《联谊报》社合作，以准备编印出版《人杰地灵话浙江》一书为题，通过该报刊登征稿启事，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短期之内就收到来稿一百多篇（其中有少数文稿随即在《联谊报》上先行发表）。但在审选来稿时，却发现原先的编辑意图和出版计划极难实现，因为既然是以“人杰地灵”为主题，应征稿的作者们自然不约而同地都在选取浙江最出类拔萃、家喻户晓的著名人、事、地、物上做文章，然而恰恰是知名度越高者，人们对有关的史料内容越是熟悉，各种书报刊物介绍得也越多，如果把这些文稿汇编出书，结果必然与当前书刊市场上已屡见不鲜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之类的通俗型知识性读物大同小异，只能给读者以似曾相识、“炒冷饭”之感。由于此类书稿已了无新意和特色，也就失去其出版的价值，因此，大部分应征文稿都无法采用。于是，编辑部除向应征作者致函，说明编辑计划需作重大调整，来稿不能刊用，表示感谢和歉意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书的编辑工作也陷于进退两难的停滞困境。

初战虽然受挫，编辑出版计划也不得不一再推迟，探索却仍在继续，经过在编务会议上多次反复的研讨、争论，一个个新的设想和方案被不断地提出，又不断地被否定，终于使意见渐趋一致，思路日益明晰，从而摆脱了总是想体现所谓的系统性、完整性、权威性之类作茧自缚的沉重框架约束，重新选定《话说浙江》这样一个比较宽松自在的书名。在选材命题上，不妨“杂”而不求全，以多少有些新意为主而不计知名度的高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选取那些既能体现浙江的特色，而对多数读者来说尚知之不多（或不详），又确能增长见识，有所

启示、教益、激励、借鉴意义的史料片断，予以推陈出新的介绍阐发。既不企求在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中面面俱到地系统反映浙江古往今来的全部历史与现状，更不去徒劳地重复那些众所周知而了无新意的旧闻故事，无论人、事、地、物，撷取其点滴片断的史实而务求赋以新意或增纳新的信息，内容固然必须求实存真，形式却要尽量精练活泼、生动鲜明。打个比方，它不是史学领域里学术论著类的正规主力军，也不是以“三亲”史料为特色的传统文史资料类那样的“地方部队”，而是机动灵活的民兵、游击队；是文学作品中的杂文、笔记，戏剧表演中的小品，乐坛上的轻音乐，菜肴中一碟清爽可口的小菜，以其“轻”（篇幅短）、“新”（立意新）、“活”（文体活）的特色，试图替代以往文史资料读物的老面孔，换副新的面貌，形成自成一体的新风格。力求使它对于不同年龄、职业、层次的读者朋友们少长咸宜，雅俗共赏，信手翻阅，开卷有益，浏览之余，间或有得，化融为萦结心怀的爱国爱乡情思，不但使浙江的父老子女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尤望广大的外省人士和海外读者能由此而增进对浙江的了解和喜爱，共同来开发振兴东海之滨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

在关怀本书的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下，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形成现在这本集子。全书共汇集了80篇文章，其中除少数文章（不到全书四分之一）是选用了原先《人杰地灵话浙江》的应征来稿外，多数文章都是在改定新的编辑思路以后，重新组稿征集编撰的。本书因系编撰史料性的作品集，除独立编写的文稿在文后括号内署明作者姓名外，对于少数主要是根据他人作品内容重新改写的文稿，均在文后括号内署明“某某人根据某某作者的文章改写”，以示对原作者和改写者各自劳动的尊重。在此，谨向所有直接或间接为本书提供过有关资料

的朋友和同志们（包括《人杰地灵话浙江》应征稿的全体作者）深致谢意！

本书的编排体例因其内容的“杂”，而很难列出明确严密的顺序，只能大体上将有时代先后可分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依次编为“人事篇”，而将难以时间区分的风土物产介绍编为“风物篇”。这种纵横结合，于无序中勉求有序的编排体例，也仅是一种不成熟的尝试，并非是故意刻意标新立异的。

作为文史资料读物求变创新的初次尝试，本书犹如史苑百花园中初绽幼芽的一棵小草，其不成熟和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例如内容未必每篇俱有新意，行文亦不能各章尽皆生动。编辑部同仁虽已竭尽全力，但限于水平和缺乏经验，奉献与读者朋友们的很可能仍是一只蹒跚学步的丑小鸭。归根到底，探索的成功与否，全靠我们的“上帝”——广大读者来裁定。恳祈各界读者不吝赐教，帮助和支持我们在不断探索求变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

1993年8月

# 目 录

## 人 事 篇

古越先民与华夏文明	( 1 )
“小人物”发现“大文化”	( 5 )
西施生死之谜	( 8 )
严子陵与钓鱼台	( 11 )
“生子当如孙仲谋”	( 14 )
浙江山水与谢灵运	( 17 )
钱镠和钱江海塘	( 21 )
沈括与石油	( 25 )
恶僧杨琏真加盗掘宋陵	( 27 )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 30 )
髹漆名匠杨埙	( 32 )
日本的“孔夫子”朱舜水	( 35 )
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	( 37 )
芥子园与李渔层园“捉鬼”	( 41 )
海宁陈阁老和乾隆皇帝	( 44 )
龚自珍的廉政观	( 47 )
生而列传的李善兰	( 50 )
闲话绍兴师爷	( 52 )

葛云飞浴血抗英军	( 55 )
杨乃武巧联救人命	( 57 )
吴锦堂与张尊三的发财机遇	( 60 )
“树人百年，两浙无两”	( 62 )
争主权集资修铁路	( 65 )
“大路，大家走的路”	( 68 )
两位文化巨人的君子之交	( 69 )
施肇基与收回青岛主权	( 73 )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 76 )
“一师风潮”与经亨颐	( 79 )
近代先驱浙人多	( 82 )
烟雨迷濛 开天辟地	( 85 )
都锦生与织锦画像	( 88 )
“一八艺社”和力扬	( 91 )
徐志摩“飞上了天”	( 94 )
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首次殊荣	( 97 )
抗日殉难的爱国企业家	( 99 )
双松挺秀赞二郁	(102 )
蒋百里与钱学森	(105 )
父子两代俱精英	(108 )
沙氏昆仲五俊杰	(111 )
竺可桢和苏步青的友谊	(114 )
太虚法师其人其事	(117 )
竺素娥和姚水娟	(120 )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124 )
治蝗元勋	(128 )
周恩来五访茶乡	(131 )

中美友谊 历史佳话	(134)
飞越长城的浙籍台胞	(138)
赵四小姐的祖籍和家世	(141)
东阳“教授市”	(144)

## 风 物 篇

丝绸之府 源远流长	(148)
《茶经》和茶文化	(151)
扇文化和杭州名扇	(155)
会稽山下禹王庙	(158)
兰亭与沈园	(161)
天台国清寺小记	(165)
围棋与天台山	(168)
临安南宋皇城	(171)
南宋京城的民间戏艺	(174)
衢州孔子南宗家庙	(178)
杭州凤凰寺	(181)
漫谈浙江藏书楼	(183)
《聊斋志异》的最早版本	(188)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190)
人文景观汇西湖	(193)
东海明珠朱家尖	(197)
千岛湖风光掠影	(201)
安吉竹种园	(205)
龙泉宝剑	(208)
越窑与青瓷	(211)
龙井茶种种	(214)

湘笔冠天下	(217)
金华火腿趣谈	(219)
国色兰香飘越城	(222)
昌化鸡血石	(225)
中国铁笔蜡纸之父	(227)
彩石镶嵌《西游记》	(229)
能源小省 电力领先	(231)
钱江几多姊妹桥	(235)
双流奇汇	(238)
小商品 大市场	(242)
征稿启事	(245)

## 古越先民与华夏文明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一直被认为是始于中原地区，黄河历来被人们骄傲地称颂为祖国母亲的摇篮、华夏民族的发祥地。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浙江余姚河姆渡一带进行较大规模的古代遗址发掘整理，报告结果竟令世人瞩目：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一发现从此改变了华夏文明渊源流长的历史记载，揭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崭新的一页。

河姆渡遗址位于今浙江余姚市境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一处原始村落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的面积约占全部面积的7%。文化堆积厚度四米左右，叠压着四个互不相同而有联系的文化层次。据碳14测定，第四文化层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比黄河流域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尚早2000年。1973年夏天，当地群众在兴修水利时发现了这一史前先民的村落遗址后，经文物考古部门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遗存。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接合；生产工具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的骨耜和狩猎用的骨镞；陶器主要是釜、钵、罐、盆、盘等，造型简单，形状各异，多为日常生活用具，陶器上广泛运用了绳纹和刻划动植物形象的花纹，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在出土的遗物中，石器较少，骨器最多，且制作精致，用途广泛，

根据对近7000件出土遗物和大片木结构建筑遗迹和品种较多的动植物遗存的分析研究，可以确认，河姆渡文化属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早期文化，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国内外有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科研视野。经过许多专家对这处遗址遗存及其出土文物的近20年的探索研究，发现了河姆渡遗址有许多堪称“世界之最”之处，可举者有：

出土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为世界绝无仅有。稻谷出土时可以看出其叶脉和根须，甚至连谷壳表面的浮毛还清晰可辨，据农学专家的分析鉴定，认为属于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从而否定水稻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旧说。

源出于“巢”而远胜于“巢”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架木屋，其特点是防潮湿，防虫兽，适合长江流域水网地区的居民生活居住。制作精巧、结构科学的木构榫卯，其类型之多，加工之精细，为世界罕见。这种木构榫卯是金属工具未出现时的一项重大创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营造工艺水准。

河姆渡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桑蚕丝的先民。生动的蚕纹图像，桑科植物的花粉和成套的纺织工具的出土，为人们的这一推測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河姆渡人是最早脱离刀耕火种原始农业而进入耜耕农业阶段的华夏先民。耒耜已成为河姆渡人用于生产的主要工具之一，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骨耜和木耜，是河姆渡人在从原始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中经历的一种特殊的耜耕农业阶段的最明显的反映。

一只陶制独木舟残骸和7支木制船桨，是迄今发现的世界

上最早的木制水上交通工具。

一件绚丽多彩的金黄色漆筒和一件朱红色漆碗，是世界上最早的木胎漆器。

一口1.5米深的水井，是世界上最先开凿的木构水井。

.....

对河姆渡遗址的研究揭示出，7000年前，以河姆渡文化特征为主要代表的长江流域古越地区的华夏族祖先，已进入了原始农业的繁荣时期。作为原始农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渔猎和采集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生产活动。河姆渡人已过着定居生活，开始从事制陶、纺织、骨、石、木器等的手工制作，原始手工业的雏型略见一二，创作了大量的原始艺术品。与黄河流域以半坡村落遗址（今西安市东郊）为典型代表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一样，长江流域以河姆渡遗址为主要代表的古越地区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和北方各支原始文化一起共同勾勒了中华民族古老而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对河姆渡遗址的研究成果还不止于此。近来，有学者对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作进一步的考证后提出，早在那个时候，东海之滨的古越先民——河姆渡人就已经用船作交通工具，具备了海洋捕捞的能力，在凭借季候风的条件下，可能已有了海洋航行的实践，迈出了中国人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出土的独木舟残骸和木桨，是捕捞航行最直接的证据；现代航海者实际模拟航行成功的事例，又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依据，日本方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某些佐证。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稻谷从中国江南直接传入的可能性最大。他们对日本发现的一处古代遗址——吉野里遗址（距今约2300年），同河姆渡遗址进行比较，从两处遗址都发现稻谷、干栏式建筑

等，追索两国先民的文化渊源，日本许多地名带有“越”字，如“上超市”、“越生町”等，都被有关学者当成古代长江流域古越先民——河姆渡人利用船、筏，借助季风外流，远涉重洋到日本的证据。

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日本的史前文化交流始于河姆渡人，这是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河姆渡文化遗址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尚待进一步考证才能确认的新的观点。虽然中日两国发掘的考古遗址中间隔着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至今无法说清的断层，但作为一家之言，也自有其一定的理由。

如今，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研究方兴未艾。1993年，在纪念河姆渡遗址发掘20周年之际，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业已正式开馆。博物馆除文物库房外，还有三个展厅，介绍河姆渡遗址的历史状况。丰富的藏品和独特的建筑，将为进一步科学地发掘和研究河姆渡文化提供条件，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将成为研究中国江南古越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

(言均君)

## “小人物”发现“大文化”

30年代中期，在一向不为考古学界所重视的浙江杭州良渚附近，忽然发现了一处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史前文化遗迹。良渚文化是公元前3300—前2500年我国新石器时代一处史前文化，是属于余姚河姆渡文化及马家浜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是浙江新石器文化时代末期一支发展较高的原始文化，其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有黑陶与玉器。良渚文化出土的黑陶有壶、豆、盘、簋等，造型规整，表面光亮，特形为圈足上常有镂孔，有的饰以匀称的弦纹。这种黑陶具有不同于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的特点，容易干后褪色，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圜底的。而山东龙山文化则是标准的蛋壳黑陶，且平底器较少。5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式断定，良渚文化是与山东的龙山文化有明显区别的另一支史前文化遗迹，这样，良渚文化的发现，就将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与其他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区分开来。70年代初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夏鼐先生当年的判定是十分正确的。

除黑陶外，良渚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是，发现大量制作精致的玉器，有琮、璧、钺、圭、璋、璜、管、珠等。其中以琮、璧最为引人注目，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采用切割取料，琢磨、镂孔、线刻、浅浮雕和抛光等技术，图案纹样形式严谨，讲究和谐对称，造型雅致，纹饰优良，其中不乏国宝级的

珍贵文物。特别是神人兽面纹的发现，是良渚玉器研究中的突破性成果。璧、琮等玉器发现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墓葬中，时间上比中原地区考古发掘的周代玉器提早了整整一千年！

良渚文化在陶器、玉器和稻作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特点，因此，良渚文化是以独立演化为主并对周围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以良渚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之一。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中国史前文化的重大发现，竟是由一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学历不高，在考古学界毫无名气的“小人物”施昕更首先进行的。施昕更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供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在参加杭州古荡出土石器的整理工作中，他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野外勘察。1936年他回杭州附近的良渚探亲时，拣回了一些碎黑陶片，并就此专门请教了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随后又多次回良渚调查、发掘。他抱着“探究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及民族的真相”的希望，在西湖博物馆同仁的协助配合下，经历了“由地下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绘制图幅，以至报告的印刷事宜”的全过程，终于在193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良渚》。

《良渚》是解放前长江下游的第一次考古实践，也是向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当时，考古界权威学者认为，长江下游是“荒漠”之地，其文化只是由中原文化传播而来的庞杂新石器文化而已，不承认华夏文明的各支原始文化有其自身独立的演化过程。施昕更在考古学界是没有名气的“小人物”，但他认为“如果欲明瞭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况，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什么新的意义的，我们更